



# 一年新增 3000 例艾滋病背后：谁来唤醒“沉默”的大学生性教育

■本报记者 冯丽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防治艾滋病日。距离我国首位女大学生公布艾滋病身份，已过去了15年。今天，大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数量居高不下。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近日于北京启动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动上透露，每年约3000名青年学生的命运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改写。

“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它背后隐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灾难。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承载着民族的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如果这批人倒下了，中国梦何以实现？”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存同感慨地说。

### “象牙塔”里的隐秘角落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断裂的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我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从此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在《艾滋女生日记》中，朱力亚写道。

16年前，这名武汉某女大学生被艾滋病病毒迅速地推向了生命的深渊。2004年4月，在其外籍男友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回国后，她发现自己也被传染了。自那天起，朱力亚就再也没有回校上学，她的人生轨道被彻底改变。

此后十余年，艾滋病依然在象牙塔里的隐秘角落里潜滋暗长，改变着许多年轻人的命运。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从2007年~2017年，全国每年新增报告的15-24岁青年感染人数分别为234人、482人、658人、794人、1074人、1387人、1607人、2552人、3236人、3052人、3077人。十一年间增加了十多倍，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为此，我国各个政府部门先后推出多项政策加强青年大学生群体艾滋病防治。如2015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2017年国务院

办公厅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指出，教育、卫生计生和共青团等部门和单位要将性道德、性责任、预防和拒绝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近几年，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使青年学生感染的快速上升趋势得到了遏制。特别是近5年来基本控制在每年3000出头的水平。”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不过，目前的感染人数仍不可小觑。“如果每年增加3000人，4年大学期间就是1.2万人，校园艾滋病防控形势还依然严峻。”

根据今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全球报告，截至2019年，全球约有38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170万新发感染者中，15至24岁的群体占比超过三成。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2019年1-10月，全国新报告发现感染者13.1万例。按照这一数据，我国青年学生新增艾滋病病例占全国新增总病例的23%左右。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高，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表示，考虑到人口基数，从学生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概率的概率，比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的概率高出41%~66%。

尽管当前的医疗手段已经可以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寿命和正常人一样长，然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从2008年开始，艾滋病成为中国传染病当中死亡率位居第一的传染病。到2018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是其他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之和的10倍。

### 失守的“禁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一直都被视为羞耻的“禁地”。大学生群体艾滋病数量的增加，让校园性教育议题显得异常重要。社会环境的变化、性教育的缺失等，让青年学生不安全性行为潜滋暗长，使性传播成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

“当前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难点是，传统而相对保守的性观念正在崩塌。”常年开展大学生群体性教育研究的王存同表

示，大学生的性观念、性行为更加开放，首次性行为年龄提前，有性行为的人频次增加，“甚至部分大一新生觉得过了18岁还没有性行为为是一种羞耻”。

“短短40多年，我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性压抑快速走向性开放，从而导致大学生的不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快速上升。”他说。

其中，男男不安全性行为是造成青年学生艾滋病高发的主要原因。中国疾控中心资料显示，2017年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中，男男性传播占81.8%。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放射科主任李宏军表示，在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性传播、输血、母婴传播中，性传播占绝大多数，包括男性行为的肛交。

在今年6月发表于《中国性病艾滋病》期刊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陈清峰、王俊杰、韩孟杰三人，调查了我国7所大学本科男大学生性行为情况及性向自我认知，在针对3125人开展的调查中，承认有过性行为的男学生占49.2%(1539人)，承认异性性向、同性性向、双性性向、不确定性向分别为87.4%、4.1%、5.8%、2.7%。

“这个数据给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双向、同性加上性不确定性的比例超过10%，这说明青年学生的危险性行为比例很高。”程峰说。

对此，中国性学会副会长兼性教育专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表示，在个体性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给自己的性取向结论可能会不可靠。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上述研究还发现，参与调查的大三学生性行为的比例达到60.5%，承认有过同性性行为的比例占9.6%。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性活跃期，无保护性行为比例高，面临更高感染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师丽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无保护性行为原因包括强迫或威胁性性行为、得不到安全套、缺乏艾滋病相关知

识、相信性伴侣的健康状况、使用新型毒品或酒精、认为安全套会降低快感等。

她补充说，即便是大学生，思想也不完全成熟，“我们见到很多人考试结束后会‘high’一下，去酒吧、舞厅等，在这种环境里，青年学生很可能会使用一些让人极其兴奋、辨别能力下降，从而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药物，导致感染率增加”。

### 性教育“短板”待补

青年学生需要性教育。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性教育起步较晚，现有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今年5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年网络、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显示，学生对性教育的整体评价不高，仅约1/3的大学生认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超过1/5的大学生不确定有无学校性教育。

同时，57%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和父母谈论过“性”。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的性教育渠道是“主动上网搜索性知识”“上网寻找色情信息”“在网上看过色情作品”。

“在这个时代，不知为何性教育仍然难以启齿。”“若父母不说，学校不言，那谁来教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大学生群体中艾滋病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部分人的生命安全。学校应重视艾滋病预防工作，定期开展性教育课程。”……在此次采访中，来自北京、浙江等多所高校的若干名大学生对《中国科学报》说。

性教育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青年学生因为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发生高危性行为后心存侥幸心理，检测与治疗不及时，不能在2-72小时的黄金时间内进行阻断和干预；因为不了解与性相关的法律，很多人在感染后心存报复，认为感染其他人“就赚了”，而不知晓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会触犯刑法。

近年来，为提高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针对性，国家相关部委不断强调将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将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同时强调发挥家长、学生、青年志愿者、教学研究机构及行业协会在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将学生参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纳入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管理。

然而，现实仍不尽如人意。“目前性教育课开展的力度肯定不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性教育课老师张玫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青年学生会遇到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问题，单纯预防艾滋病的性教育课与把预防艾滋病教育作为性教育课中的一部分对学生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大学自己不设性教育课，请人讲课完成任务，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学生很难说。”

同时，她建议将性教育、艾滋病教育下沉到中学。“初高中毕业生到社会上工作后，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被感染的风险性更大。”

对于这一点，在近日于北京启动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动上，吴尊友也表示，社会青年每年感染的人数达到数万，远高于大学生群体。

在中财，王存同的课被学生们称为“大性课”。每学期数千人报名，只有300多人能选到课。很多学生在“知乎”等平台发帖称：“在中财没有上过王存同的课，人生不完整。”“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样的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爱的教育、性的教育，让学生尊重生命，敬畏死亡。”王存同说。

“性教育之于大学生，相当于保护他们身心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航路上的罗盘或启明灯。”王存同说，这也是他12年前放弃三甲医院的临床工作转而从事教育的原因之一。然而，他表示，当前大学生性教育课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通识性教材短缺、教具稀缺等问题。而且，性教育观念落后，制度上没有保障，相关教具甚至不能上讲台，否则就会被监管部门没收。“80%的人没有得到科学、正规、系统、完善的性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失职，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下转第6版）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副教授

今年已发生了多起高校清退研究生事件——不但博士生被清退，连硕士生都被清退。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研究生的清退或者淘汰多少是一件新鲜事。但是笔者相信，在若干年之后，这将成为常态，很难再引发大规模的舆情。尤其是对于博士生而言，清退率或者说淘汰率会越来越

高。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多所高校对研究生清退“动真格”？首先是因为我国研究生规模越来越大，在2019年连博士招生规模都超过了10万，博士生在生更是超过了40万。其次，博士生毕业与拿到学位的要求无疑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博士生需要的学习时间更长、投入精力更多，且其毕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整体而言，博士生的修业时间非常离散。在修业时间离散度高的基础上，如果博士生规模较小，还可以进行个别化管理。然而，随着我国博士生规模的扩大（而且必然会越来越大），培养单位为了减少培养的成本，就需要对其管理进行标准化，以提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与效率——开展博士生清退就是进行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步骤。

公众看到的表象是高校开始“动真格”清退博士生，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博士生培养的标准化不仅仅体现在出口环节，其他各环节也都是“动真格”的，如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的评审等。

一旦培养单位在各环节实施标准化管理，对博士生施以高标准、严要求，博士生的淘汰率必然会攀升。相对欧美高校而言，目前我国的博士淘汰率和延毕率还算低的，而导师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学生个人的户口、档案、就业等问题，导师和高校还是尽可能希望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免得“砸在自己手上”。而欧美高校，导师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其博士生的淘汰率和延毕率很高，已成为常态。尤其是世界顶尖高校博士生的淘汰率和延毕率都非常高。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著称，据说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其淘汰率可见一斑。

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博士生难以像十年前那样三四年就能顺利毕业的原因之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解释外部环境变化对博士生毕业的影响。其一，外部诱惑大、就业压力大且学生到了婚育年龄后家庭压力大，导致很多博士生对于学业和学术研究的投入减少。其二，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科研条件的改善，很多导师和博士生相对而言对待研究更加从容，期待博士生做出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博士生修业年限的拉长，甚至增加毕业的不确定性。

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为博士生的学习与科研提供支撑条件。

首先，建立弹性动态的淘汰机制。个人不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一刀切”，制定一个有关修业年限的硬性规定，而是应该让高校和导师有充分的自主裁量权。就自己作为导师的经验而言，如果博士生已经学习了8年，导师和学生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做出判断的。因此，培养单位可以在第6年向学生和导师发出一个警告，第8年给出一个“黄牌”警告。如果博士生在得到“黄牌”警告后，还没有改善，则第10年可以给出一个“红牌”警告；如果博士生在得到“黄牌”警告后，有了实质进展，则继续延期应该是许可的，相应年限可以得到进一步延长。

其次，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前期笔者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导师全方位的指导可以提高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和学术投入，而且国际上多项研究都指出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完成学业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此，笔者呼吁所有导师对自己的博士生承担起更多的职责来，而不仅仅是为学生的学习与学术负责。作为导师，笔者就帮助学生找“三助”岗，也时常关心学生的就业、婚嫁与生育等各个生活阶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还鼓励学生之间就学业给予了，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笔者认为，这样的举措会提高学生的毕业率与成材率。

最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资助。在所有正规教育阶段中，博士生的机会成本是最大的。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婚育年龄高度重合，而且在就业市场中能够赚到可观的收入。为了让博士生潜心学业与学术，应该给他们更加宽松的环境，包括比较充裕与多元的资助——充裕，是指让博士生无需为基本生活成本发愁；多元，则是指让学生能够有相应的资金开展自主的研究或者进行对外交流等。

总之，“博士生修业年限长、毕业难”未来一定会是常态。可以预见的是，我国毕业生的淘汰率在未来若干年内会持续攀升到一个水平，之后才会逐渐稳定下来。应给予博士生更多的支撑，包括学术上的弹性、导师的帮助与资助的支持等，从而使学术充满热情的博士生能够顺利毕业。

# 标准化之后，博士生「毕业难」将成常态

## “研究生不会提问”之思

# 问题意识：使研究生真正“研”起来的关键

■赵凌

“疑，思之始，学之端”，思维和学问是从疑问和好奇开始的。科学研究始于发现问题、在于分析问题、终于解决问题。问题意识是研究生形成研究兴趣、进行学术思考、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前提，也是衡量研究生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让研究生产生兴趣，在课堂上提出问题，使研究生真正“研”起来，决定着研究生能否从“科研小白”向“科研之星”华丽转身。

在传统研究生教育观念中，研究生普遍认为解答问题是科研之本。多数人虽然对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有较高认同，但提出问题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能力却比较弱。

尤其在文科领域，大部分研究生喜欢被动地接受问题，习惯坐“冷板凳”，愿意做沉默的“低头族”，不善于与他人进行学术探讨和思维碰撞，更不善于主动发表自己的学术看法和见解。所以，大多数文科研究生缺乏举一反三的思辨能力和敢于挑战权威的批判意识。相应地，对于如何提出问题、怎样分析问题、运用何种方法，多是惯性停留于表面浅层思考，缺乏对问题的深度探究和持续挖掘。

还有，一些研究生科研动机不纯也是问题之所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不是为了扎实做好学问、得到学术锻炼、提升科研能力，

而是掺杂了太多关于评定奖学金、完成毕业论文、方便求职就业等考虑。加之，自身知识储备不够、实训训练过少、科研方法单一，使得一些研究生学术视野偏窄、前沿把握迟缓、学术认知过浅，较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再者，研究生之所以提不出真问题，不会提问题，甚至没提问题，不能纯粹归咎于学生本身。客观来讲，这是研究生、导师、教学以及学术氛围等多方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少数高校教师对研究生培养的投入精力不够，这也是导致研究生难以形成问题意识的间接原因。不可否认，研究生导师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人格魅力和指导强度，对研究生的学术兴趣、问题意识、思辨能力等方面均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随着国家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部分研究生导师由于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相对繁重等原因，对研究生问题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

目前，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也多以讲授为主导方式。这种方式更为关注的是研究生对于现有知识体系的构建，而非研究生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以及专业问题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教学实质是本科教学模式的复演，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训练，

使研究生较难超越现有知识和固化思维的局限，无法形成科学有效的问题意识。

此外，社会文化中的和谐之道以及对权威真理的过度信任，使研究生对学术专家的观点大多是认同和吸收状态，普遍缺乏对权威观点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以致难以突破现有思维藩篱，不敢提出问题。

针对目前研究生科研问题意识水平不高的现状，基于对研究生科研问题意识影响因素的分析，破解之道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注重研究生科研兴趣培养与知识结构优化。创造最佳学习和认知发展条件，使研究生在参与科研活动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与体验感，以激发研究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导师在学术训练中的牵引作用。加强导师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训练和指导力度，并强化对研究生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引导，增强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

三是转变教学方法，强化教学过程对研究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大量开展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拓展思维、勇于创新，积极对已有知识经验进行加工创造，启发并引导学生发现新问题、采用新方法、设计新方案。

四是创设敢于批判和民主自由的学术



赵凌

环境和氛围。借助信息技术搭建知识互动平台，引导研究生树立学术自信，鼓励参与学术交流，以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已有观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创设良好的学术争鸣与切磋氛围，持续锻炼并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精神。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更新均来源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作为学习和创造的起点，其产生于对书本知识的领悟，源自于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发现问题并着力解决问题，是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综合体现。归根根本，研究生教育就是要让研究生真正“研”起来。（作者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